

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发展与改革思路初探

常修泽

近期,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《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》,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0月至2025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。

文章强调,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,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,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。新中国成立不久,我们党就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。从第一个五年计

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,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、在战略上不断成熟、在实践上不断丰富,加速了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。

文章强调,谋划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,必须准确把握“十五五”时期的阶段性要求,着眼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,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,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、提出思路举措。

本文初探四点思路与建议。



常修泽

认识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发展改革的三个“跨越性转变”

“行棋观大势,落子谋全局。”准确把握“十五五”时期所处的国内外大势是制定科学合理发展策略的基础。从国际环境看,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,我国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,大幅开放市场,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数字化浪潮,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较为顺畅的阶段。然而,当前全球贸易增速放缓,贸易保护主义抬头,加之俄乌冲突、中东局势等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发酵,对全球供应链和金融市场造成冲击,我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可能遭遇较大的风浪和较强的冲击,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。

从国内发展来看,笔者认为,我国发展与改革正面临着三个“跨越性转变”。

第一,由“规模速度型”向“高质量发展型”的跨越性转变。我们国家正无反顾地向过去那种过多依靠扩大产能、增加产值的粗放型发展模式“告别”,而使经济转向追求质量与效益的新阶段。这要求在经济增速合理的基础上,更加注重经济结构的优化、创新能力的提升。尤其是在科技创新上,应从“制造大国”向“创新强国”进行转型,这场转型不仅关乎产业升级,更是国家竞争力重构的战略抉择。

第二,由“人口红利”向“人才红利”的跨越性转变。新中国成立后,我国劳动力

规模随人口的增加而扩大,这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“人口红利”。现在我国劳动力依然充沛,但“人口红利”的明显减少是不争的事实。与此同时,笔者在研究《人本体制论》和《创新立国战略》过程中,深感随着国人科学文化素质显著提高、健康水平持续改善,“人才红利”已经明显呈现。因此,在“十五五”时期,更应注重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,笔者认为,中国实现“三高”(即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、高质量发展、高水平对外开放)需“高人”,“高人”重点有三大人群,即劳动者、科研人员、企业家。人本根基扎得深,就能激励调动人,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活力。

第三,中国市场化改革由“商品市场化”向“要素市场化”的跨越性转变。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二十届三中全会贯穿一个改革亮点——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重在完善要素市场制度,这是深化经济改革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。我国全社会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在2022年就已经达到97.5%,但包括劳动、土地、资本、知识、技术、管理、数据七大生产要素在内的要素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,需要从市场配置改革入手,提高要素市场化程度。

建议将“人类发展指数”纳入“十五五”相关指标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谋划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,要不忘初心,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,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,稳步推动共同富裕。

法国经济学家佩鲁(Perroux)在《新发展观:基本原则》一书中指出,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、社会、人、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·森(Sen.Amartya)也提出“以自由看待发展”的理论,强调发展的本质在于“扩展人的可行能力”。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。“十五五”时期,我们应注重覆盖全人群、全生命周期的人的全面发展。在此,笔者建议将联合国“人类发展指数”纳入“十五五”时期设置的相关指标。

联合国的“人类发展指数”由健康长寿、知识的获取和生活水平三部分内容构成,它体现了“以人为本”的发展理念,是衡量“每个人”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。将“人类发展指数”纳入“十五五”相关指标,一则,有助于促进中央提出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“投资于人”,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优化资源配置,将公共资金和国家资源优先用于覆盖全人群、全生命周期的健康、教育、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。二则,促进各地区各部门更加注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,以满足全社会各个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新需求。三则,在国际上,切实提高我国在联合国“人类发展指数”排行榜的排名,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。

从应对国际变局的“保、进、创”高度,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

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。“十五五”时期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,我们的“立意”,应该再“高”一些

——不仅从中国国内现实切入,而且从应对“国际变局”高度思考和把握。在当前国际形势动荡,特别是大国战略利益

“移向亚太”的新形势下,我们怎么办?笔者认为,可抓“保”“进”“创”三个关键。

一是“保”,即力保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宁。如何确保?“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,存在于民众之中”。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风浪或挑战,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势在必行。全体国民,无论何人,所有企业,无论国企还是民企,都应团结一致。基于此,建议对民营经济要有这种新的思维,即从“增强全民族凝聚力”这一战略高度,思考并确立民营经济的战略地位及发展价值。

二是“进”,即中国应积极参与“进”国际新秩序的制定中。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,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期待。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,理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。

从推动经济发展上来说,中国应积极参与“多边+双边+诸边”协定重构,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与调整作出更大贡献。同时,从地域上来说,中国在加强全球经济合作上应继续“进入”相关地区。在这方面,全国应学习浙江发展“地瓜经济”的经验,把对外开放的“藤蔓”延伸到域外更多地方去。

三是“创”,激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。2024年,笔者在杭州调研了一批新兴民营企业,它们在AI技术革命领域迸发出澎湃活力。进一步调研发现,浙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在创新上不断取得成果,关键在于政府部门“牵好线、搭把手”,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新环境。尤其是对于初创型科技企业,浙江给予它们足够的空间,让年轻创业者“心灵放飞”敢闯敢干。

把握好新科技革命带来的三个层次“倒逼”

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全面推进“十五五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,而科技创新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影响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。荀子在《天论》中有名言,“天行有常”“应之以治则吉”。此处讲的“常”,就是客观规律,如能顺应规律治理国家,其结果必然“吉祥”。“十五五”应从时代的高度“应之以治”。建议把握好科技创新带来的三个层次“倒逼”。

第一个层次是对“生产方式”的倒逼,特别是倒逼其中经济结构的调整与变革。经济研究表明,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部,有个“生产方式”问题,突出表现为“经济结构”。一是供需结构:重在进一步“拓需”,即以拓展需求为重点,着力创建需求导向的“需求与供给相结合”的供需结构。二是产业结构:重在进一步“拓数”,即以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等“新质生产力”为引领,因地制宜创新产业结构。近年来,数字科技、能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,倒逼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、生物产业、高端装备制造产业、新材料产业、新能源产业、智能及节能环保产业、数字创意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。

“十五五”时期要继续瞄准发展新兴产业,同时还要以更大力度以科技赋能“传统产业”,同时谋划“未来产业”。四是“拓绿”:以“绿色”为底色,创新“可持续发展”的环境资源结构。这些结构性问题,不仅关乎“十五五”时期,而且也关乎未来。

第二个层次的“倒逼”是对“生产关系”的倒逼,要求生产关系及其制度与之

适应。这是必然的趋势。但这里笔者特别提请注意: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对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”的内涵作了最新表述,即把“公有制为主体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,按劳分配为主体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,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”共同纳入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”框架,改变了以往的单一传统定义,这体现了党中央对“经济制度体系”认识的深化。并且这一表述在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正案中得到确认和完善。这就要求我们在“十五五”时期,必须继续在所有制结构、分配制度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方面,以更大的勇气和魄力推动改革创新。

第三个层次是对某些社会事业部门的倒逼。随着人工智能的爆火,文化教育、医疗卫生甚至社会科学研究等部门,都将遇到新的挑战。例如,对于从事理论研究的同行来说,面对DeepSeek的记忆力、捕捉力、分析力和概括力,如果你没有新思想、新观点,净说别人说过的话,显然不行。而当前,社会领域的知识、技术、管理、数据等要素的优化配置仍不太理想,这就倒逼着推动某些社会事业部门的改革。

总体而言,“十五五”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。“苟利于民,不必法古;苟周于事,不必循旧。”面对国内外最新发展态势,我们要有战略眼光,高质量编制“十五五”规划,前瞻性把握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我国的影响,因势利导对经济布局进行调整优化,引领全社会力量朝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。

(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